

贺雪峰 袁 松 宋丽娜 等著

以2008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例

农民工返乡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贺雪峰 袁 松 宋丽娜 等著

农民工返乡研究

以2008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例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民工返乡研究：以2008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例 / 贺雪峰等著.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7

ISBN 978-7-209-05409-6

I. ①农… II. ①贺… III. ①农民—劳动就业—研究—中国 IV. ①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4276 号

责任编辑：王海玲

封面设计：武 斌

农民工返乡研究——以 2008 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例
贺雪峰 等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65mm×235mm)

印 张 20.7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409-6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目 录

导论 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民工返乡	1
--------------------	---

第一章 农民工打工与返乡现状	36
----------------	----

第一节 农民工个体	38
-----------	----

第二节 农民工的家庭生活	47
--------------	----

第三节 农民工的村庄生活	58
--------------	----

第二章 农民工的情感世界	64
--------------	----

第一节 又爱又恨的城市	64
-------------	----

第二节 也爱也恨的家乡	68
-------------	----

第三节 农民工的亲情	73
------------	----

第四节 打工青年的恋爱与婚姻	77
----------------	----

第三章 农民工返乡历程	86
-------------	----

第一节 农民工返乡过程的基本特征	86
------------------	----

第二节 农民工返乡的心路历程	92
----------------	----

第三节 农民工返乡历程的群体差别	96
------------------	----

附录:返乡历程的深度个案	102
--------------	-----

第四章 返乡农民工的村庄适应 114

第一节 农民工返乡的村庄背景 114

第二节 返乡农民工村庄适应的代际差别 118

附录:福州市永泰县赤锡乡寿山村四例返乡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126

第三节 返乡农民工的村庄生活 129

第五章 农民工返乡与村庄吸纳 143

第一节 人均耕地多的村庄吸纳 144

第二节 人均耕地少的地区的吸纳情况 151

第三节 村庄其他方面的吸纳 160

第四节 扩展性讨论:慎防新的城市剥削农村 166

第六章 “打工经济”中的小农家庭 170

第一节 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农民工返乡 170

第二节 “离土不离家”的农民工 180

农民工返乡调查报告摘编 192

打工无前途,回乡没意思——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调查 192

金融危机下的返乡农民工——贵州省湄潭大寨村调查 197

务工与返乡——江西萍乡余家山下自然村农民工调查 204

农民工返乡调查——以江西省 S 县 Y 乡桃村为例 211

那些城市过客们的生活——广西兴安县一甲村调查 217

理性的纠结——福建永泰下湍村农民工调查 222

小农经济与外出打工——河南省光山县 G 村调查 233

两代农民工——豫东虞城县董北村调查 239

农民工:走出去,返回来——湖北阳新宏村调查 244

离乡与返乡——湖北恩施安乐屯村调查 257

失去家园的第二代农民工——来自湖北阳新县大王镇的调查报告	267
外出务工与农民闲暇——湖南长沙新胜村农民工状况调查	270
难舍难留——鲁西北章村返乡农民工调查	273
在打工的路上——皖北老集村农民工返乡调查	282
返乡农民工——湖北房县化龙村调查	292
外出还是留守？——福建长泰县新村返乡农民工调查	297
劳累与迷茫——湖北石首市五码口村返乡农民工调查	298
非稳定就业——湖南汉寿县断堤村刘家组调查	300
打工者素描——湖北随州市黄村调查	301
农民工返乡的适应——江西新余市雁塘村调查	305
农村吸纳金融危机的机制——贵州湄潭县返乡农民工调查	309
流动中的婚姻——山东临清市瓦房村农民工调查	312
打工潮下的小农生计——鲁中磨石村农民工返乡调查	315
变迁的时代——山东莱芜市西施村农民工调查	316
打工对婚姻的影响——河南南乐县西村农民工调查	318
寻求生存——河南栾川县上园村农民工调查报告	320
后 记	322

导论

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民工返乡

2008 年底的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约 2000 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加上年底休假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人潮,2008 年底返乡农民工的人数高达上亿。如此巨大规模的返乡农民工的状况如何?2000 万失业农民工的前途如何?2000 万人失业,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引起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那么,金融危机引发的 2000 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如何吸纳这种影响?

2009 年春节不是一个平静的春节。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都在高度关注返乡农民工的状况。社会主流意见是,若不采取正确措施,2000 万失业返乡农民工将会引发巨大的社会—政治问题。西方媒体预言 2000 万失业的返乡农民工会造成严重问题甚至引发中国的社会政治危机。

最近 20 年,西方世界经常预言中国会因为政治社会危机而崩溃。这次金融危机引发 2000 万农民工失业,一如既往地成为西方作为中国崩溃论的证据。当然,这种预测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而在 2008 年底,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的担忧也被证明属于多虑。

西方对中国 20 多年来一再预言错误,与西方不了解中国农村——这一中国社会重心——的状况有关。由于道德话语越来越占据优势地位,中国社会各界也越来越不懂得中国农村。不懂得中国农村,就读不懂中国,就会在各种国内、国际的政治的经济的危机面前不知所措,进而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预测错误和应对失误。

中国农村包括在乡务农的约 7 亿农民和进城务工的约 2 亿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并未真正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离开农村,他们甚至无法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即他们不能在城市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体面地生存下去。或者说,进城务工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并未真正彻底地脱离农村,也无法彻底地脱离农村。而正是因为这些进城农民工没有彻底脱离农村,当他们年龄比较大、在城市找工作困难时,他们就可能回乡。而 2008 年底金融危机造成 2000 万农民工失业,这些失业农民工也可以返乡。他们有家乡可以返回,且返回家乡后可以住下来,可以生存下去。

中国 9 亿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又可以顺利返乡,这就使得中国既可以从工业化中获取好处,又可以避免工业化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理解中国式的农民进城与返乡,及构成农民进城与返乡结构性前提的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是理解中国农村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前提。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我们才可以理解中国农村这个重心为什么能够保持稳定,才可以理解中国农村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也才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危机,并从全球化中获益。

本书中,我们希望通过 2008 年底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失业农民工返乡的调查,对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进行研究,来初步回应以上问题。我们希望借此深化对中国农村的认识,深化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提出我们认为重要的政策建议。

本书是在 2008 年底和 2009 年上半年,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组织的数次调查基础上写作的研究报告。这几次调查主要包括:2008 年 12 月底在贵州、湖南 2 省 3 县 7 村所作为期 20 天的驻村调查,2009 年春节在全国 11 省 30 村所作寒假调查,以及 2009 年 3 月~4 月分别在湖北、河南、湖南等省开展的农民工返乡社会适应状况的专项调查。后述报告重点介绍调查情况,导论部分则是一个理论的框架和总体的思考。以下分八个部分来展开导论。

一、农民工返乡的逻辑

2008 年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并非农民工随机地返乡,而是受工种和年龄因素影响明显的结构性的返乡。具体地说,2008 年由美国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能力降低,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因此受到影响,大量

外向型出口加工业订单锐减,出口下降,而被迫关停。加工业生产线所需劳动力减少,工厂因此裁减劳动力或减少劳动力的加班时间,引发农民工失业或工作不饱满(加班时间变少)。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的农民工失业,首先是工厂关停所造成的失业,是从事一般工厂生产线作业的“普工”失业。

对于生产线上的劳动来讲,年龄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指标,因为生产线作业,长期从事单调的重复劳动,需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尤其是要有长时间的注意力集中。生产线作业不同于重体力劳动,需要灵巧、敏捷、反应迅速、注意力集中、耐力长久等身体机能,否则,生产线上就会出现大量的报废产品。这些身体机能与年龄直接相关。年轻人心灵手巧,反应敏捷,很适应生产线的作业。随着年龄增大,反应能力下降,其生产线上出错率增加,从而出现产品报废率的上升。因此,在工厂生产线上,年龄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指标。有些生产线对年龄的要求达到很高的程度,比如只要18岁~24岁女工,即是说,超过24岁女工的反应能力就已开始下降。

年轻人数量是有限的。在金融危机之前,工厂招收生产线工人的年龄界限有所放宽,比如可以放宽到35岁甚至40岁。而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工厂需要减少劳动力,工厂便首先淘汰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年轻农民工即使因为工厂关闭而失业,也相对容易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当然,这些仍然保留了工作机会或找到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年轻人,因为加班时间减少,收入会降低。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工则首先被从生产线上淘汰下来,而转入重体力的、高污染的、高风险的行业。还有相当部分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开始返乡。但这次返乡与过去不同,这次他们是一返而不复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由此告别进城的漂泊生活,而回到家乡的农村。事实上,这些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之前即已在计算何时返乡。他们说,现在务工收入还是不错,体力仍然够得上,在家的父母仍然能够劳作,那就再多干两年,再赚上两万元钱后就回家。现在金融危机了,工厂关停了,工资下降了,务工也很难攒钱了,因此也就提前打道回府,不再受资本家的剥削。

也就是说,2008年底金融危机引起的农民工返乡潮中,返乡的主要是年龄比较大、家庭负担比较重、从事生产线劳动的农民工。这些返乡农民工其实并非是突然遇到返乡这个问题,而是早在考虑何时返乡的问题。在这次金融危机引起的返乡潮之前,他们就已明显感到自己年龄偏大,不如年轻人心灵手巧,体力精力越来越难以适应生产线上的高强度劳动要求,并一直在考虑何时返乡的问

题,在考虑是再坚持几年,还是现在就回去。金融危机引发的农民工失业,不过是加快了年龄偏大农民工的返乡步伐,实施了他们的返乡计划而已。

那么,金融危机对于农民工返乡计划的提前,有多大一个时间量呢?我们来计算一下。

假定农民外出务工年龄为18岁~40岁,则共有23个年龄段的农民外出务工。据统计,当前进城务工农民人数约为1.6亿,取平均数,每个年龄段的务工人员为700万左右,三个年龄段的务工人员即达2100万。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以年龄作为淘汰的依据^①,则金融危机导致2000万农民工失业,仅仅相当于让农民工提前三年返乡,即由原计划40岁返乡提前到37岁返乡。

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农民工大规模失业,不过是将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早已决定返乡的时间提前三年而已,因此农民工失业问题当然也就不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这就是虽然发生了2008年农民工大规模返乡,但并未出现海外媒体的悲观预测及国内专家学者们担忧情况的原因。

二、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

构成2008年金融危机大规模农民工失业返乡却没有引发中国的政治社会危机的原因,是农民工进城后,其实并没有真正将自己当做城市人,而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村一员。他们清醒地知道,进城务工是自由的,但在城市体面生活下来则是困难的。在城市挣钱在农村用,钱是经得起用的,在城市挣钱而在城市用,钱就不经用了。

这里面就牵涉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农民进城后,他们是否准备回去,是否愿意回去;二是农民的收入构成如何,或者说当前中国农民家庭是如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据我们的调查,农民有两种不同的外出务工的逻辑,一种是外出务工是为了体面地回去,另外一种则是为了永久性地离开。第一种逻辑是说,农民之所以外出务工,是因为村庄中增加经济收入的机会太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土地,无法让农民致富,农业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民为了致富,为了建一栋像样的房子,为了给儿子娶上媳妇,而不得不外

^① 这只是一种假设。年龄当然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主要因素。

出务工,外出务工不过是农业之外的兼业而已。

按这种逻辑外出务工的农民,他们外出务工的目的就是赚钱,赚钱就是为了汇回家乡,用于建房,用于购买奢侈品,用于体面地消费。总之,在外面赚钱无论多么辛苦都不要紧,关键是能否赚钱从而可以在村庄中消费,并从村庄消费中获得意义感。这种逻辑下,农民的意义世界在村庄中,他们人生的参照对象是村庄的亲友,而不是城里人。他们的归属在村庄,根也在村庄,因此,他们的生活是有情、有义、有根的生活。外出务工是手段,而赚钱回家是目的。

第一种逻辑的外出务工,多体现在第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身上。第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多是在成婚之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外出务工挣钱,以补贴家用。他们在村庄中已经生活多年,并在村庄中建立了自己的意义世界。且第一代农民往往是丈夫外出务工而妻子在家务农,外出务工的丈夫当然是要赚钱回来养家糊口的。

第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很多是进入城市建筑业中,且往往是随着本村包工头、小老板而进城做建筑工人的。稍后,越来越多农民进入沿海制造业的生产线上工作。进入工厂工作的农民工,越来越要依靠一定技术,精力充沛,而不是依靠体力。生产线上的工作,体力强度下降了,但对身体的耐力要求增加了,对动作、准确性的要求增加了,这是年轻人的事业,初中毕业不久的未婚青年正是生产线上最好的工人。这些初中毕业即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没有真正在村庄生活过,对村庄意义世界缺少理解。他们所受教育和从电视上看到的外面的精彩世界,极大地吸引了他们充满幻想的心灵,他们厌恶村庄平淡的生活,希望到城市见见世面。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同村外出务工年轻人在春节回来时,带回各种新奇的电子产品,讲起各种让人向往的故事,还有业余时间热烈的恋爱,全国不同地区的不同习俗及相互交往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年轻人(甚至初中还未毕业)急不可待地要外出务工。外出务工的首要目的已不再是赚钱,而是为了看外面的花花世界,为了见世面,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即使务农收入比外出务工收入高,这些年轻人也不愿在家务农。这种外出务工是为了脱离村庄融入城市的逻辑。也就是说,农民外出务工的第二种逻辑,是为了永远不再回来的外出务工。第二代农民工往往会认同这种外出务工的逻辑。

以上两种不同的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并不是简单地分别由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所有,而是有着更加复杂的分布。

举例来说,在河南调查时,我们发现河南农民(尤其是豫北农民,如安阳、开封农民)显得保守,年轻女子大都外出打工,一旦结婚则往往不再外出。这样一来,在豫北农村,农民外出务工的模式往往是妻子在家务农、带小孩、理家,丈夫外出务工赚钱。妻子在农村务农理家,丈夫外出务工就不可能是为了永久地离开,而只能是在外面赚钱回来盖房子,过日子。这种情况下,丈夫打工赚钱的目的就是拿钱回农村的家中过好日子,因此,在城市的生活一定要节俭,城市是别人的,她们的生活则是在农村,在未来。这与那些未婚进城务工青年的消费逻辑完全不同,未婚进城务工青年人关注的是当下的城市生活体验,甚至是所谓“月光族”。

为了拿钱回家,而不是为了留在城市,这类进城务工的农民所看重的就是收入,而不是城市生活的体验。他们因此倾向选择收入较高,可以挣到钱的重体力劳动或对身体有一定危害的地方工作,比如到建筑工地、煤矿等打工挣钱。有时也是因为建筑工地、煤矿这些相对依靠重体力活的艰苦的场所工作,而强化了他们终究要回农村去的想法。

而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村内部的价值生产能力比较弱,大家一心向外发展。村民认为真正有本事的就该到城市买房子,或到城里找到高收入工作,而不关心村庄内部的竞争。因此,这些地区的农民即使外出务工赚了很多钱,也不愿在村庄盖房子,村庄中的住房都很老旧,如湖北荆门农村和四川成都平原均是如此。而另外一些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强的农村,农民在外赚钱的重要目的是回村盖房,农民之间的建房攀比达到很高的程度,如河南、江西农村,及湖北的鄂东南山区。

此外,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倾向于进城。因为农村明显女少男多,女性就可以向男性提出婚嫁的条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男方必须在县城买一套房子,从而使得年轻夫妻将来年龄较大而无法在大城市或沿海城市继续打工时,还可以回到县城生活,而不是回到乡下生活。

中国农村大规模外出务工,大致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的,之前的外出务工主要是成家后的农民进入建筑业等行业。2000年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使得大批年轻的未婚农村青年进入工厂生产线工作。生产线上的单调生活进一步使闲暇变得重要,未婚青年一起逛街、喝酒、娱乐,从而产生了爱情及跨省婚姻。这些一开始即接受现代文明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年轻人,是不愿意再回到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农村了。

总结以上所述,构成农民外出务工不同逻辑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

1. 第一代农民工还是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倾向于第一种逻辑,第二代倾向于第二种。
2. 进城务工之前的婚姻状况。已婚农民进城务工更倾向于第一种逻辑,未婚者倾向于第二种。
3. 进城务工前是否有村庄生活经历,尤其是村庄务农经历。有过务农经历的倾向于第一逻辑,初中毕业即进城务工的倾向于第二种。
4. 夫妻单方进城务工的农民倾向于第一种逻辑,夫妻双方进城务工的倾向于第二种。
5. 未婚女青年较未婚男青年更倾向于第二种逻辑。
6. 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强的农村,外出务工农民更倾向于第一种逻辑。
7. 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更倾向于第二种逻辑。
8. 在工厂流水线工作和从事较高收入的服务行业者更倾向于第二种逻辑,重体力和高危行业工作农民工倾向于第一种。
9. 高收入农民工倾向于第二种逻辑,低收入者倾向于第一种。
10. 在城市或县城经营小生意者倾向于第二种逻辑。

以上是从外出务工农民行为逻辑差异的原因方面来讲的。我们还可以从结果的方面来分析,择要讨论如下:

一般来讲,外出务工第一种逻辑的结果是,农民大量外出务工赚了很多钱,这些钱被带回到村庄消费,村庄因此变得更加繁荣:越来越多的新房建起来了,农村人情越来越大,婚丧礼仪越来越隆重。因为农民外出务工获得了更多资源,这些资源滋养了村庄的各种传统和价值,村庄显示出勃勃的生机。

农民外出务工第二种逻辑的结果则大不一样。因为农民外出务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永久性地离开,所以,外出务工的农民并不带回资源。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民要么在城市愉快地挥洒青春(尤其是刚进城不久的未婚年轻人,他们往往会轰轰烈烈的恋爱一场),要么积攒收入以在城里买房(主要是在县城和镇上买房。他们基本上没有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买房的希望)。总之,这种农民工的外出,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出,而且是资源的流出。因为劳动力的流出和资源的流出,而没有资源流入,农村衰败速度进一步加快,各种传统和价值因为缺少滋养而快速消失,村庄的人际关系逐渐陌生化,成为无法生产价值和舆论的荒漠。

当然,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外出务工逻辑并非以上所说泾渭分明,往往是每个地区的农村中,既有第一种逻辑,又有第二种逻辑,且每个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也可能在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处境下变换自己的行为逻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控制因素即年龄与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状况。正如上列十种差异中的大多数一样,一个人会有青年、中年、老年,会有未婚、已婚,生儿育女,成家立业,会有职业转换,会有成功或失败,会有预料不到的因素。所以,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逻辑,不能绝对地看,而要辩证地看,不能只看意愿,而且要看现实条件。

再来看农民收入的构成。决定农民外出务工逻辑的最为重要的现实条件是他们家庭收入的构成,及他们随着年龄增长而来的完成家庭结构再生产的现实压力。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中国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是务农收入与务工收入,其中务农收入约占 53%,务工经商收入约占 47%。这并不是说,中国有 53% 的农户纯依靠务农收入,而另有 47% 的农户纯依靠务工经商收入,而是中国大多数农户家庭中,既有务农收入,又有务工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农户家庭收入的构成与其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密切相连,这种联系就是,年轻人往往外出务工,而中老年人在家务农,农户家庭通过这种代际分工来获得务工和务农的两份收入。

农户家庭收入的这种构成,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一般农户家庭收入的普遍模式,即几乎每个农户家庭都有人外出务工,同时又有人在家务农。一般农户家庭的这种收入构成,是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关键。

具体地说,中国农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耕地,只能容纳比较少的农业劳动力。一个农户家庭,可能有中老年的父母和年轻的子女,子女结婚后又生有小孩,结婚的子女就是年轻的夫妻。这样的家庭结构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在家务农,事实上,他们也不大可能外出务工,因为他们年龄太大,外出务工已经没有体力和精力上的优势。不过,从务农的角度看,50 岁甚至更大年龄却仍然是务农的好把式。尤其是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轻简便农业技术不断推广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对体力的要求大为降低,50 多岁甚至更大年龄的人都可以应对农业生产。当前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是由老头老太太们来从事农业生产了。

而农村中的年轻人,即使从事农业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他们也不愿在农村

从事农业生产,不愿与泥巴打交道,而是希望到城市见见世面,到窗明几净、干净卫生的生产线上劳动。同时他们又具备进城务工所需要的精力、体力和基本技能(学习技能的能力)。

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在家务农,即使收入有限,也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应对家庭的日常性支出(比如人情往来等)。这样,年轻子女外出务工赚的钱就可以积攒下来,成为家庭的纯收入。

可以说,正是因为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及由父母带着他们的孙子孙女在农村生活的低成本,才使得当前农户家庭收入可以超越温饱,使得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可以成为家庭的纯收入。

反过来,如果当前农户家庭收入中缺少以上任何一笔收入,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就会变得困窘。当前农村的困难户大都集中在缺少可以外出务工的青壮劳动力的家庭,而一旦这些家庭中初中毕业的子女开始外出务工,其家庭收入状况就会迅速改变。当前中国大多数农村,农民家庭收入状况与家庭人口生产周期有关,这正是恰亚诺夫在研究俄罗斯小农时发现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在中国小农耕地有限的情况下,农户家庭可以让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从而可以获得对于家庭收入极为重要的务工收入。而一旦一个家庭中,子女仍未成年或因继续念书而无法外出务工,父母又已生病或年老,也不再能外出务工,则这个家庭就只能是务农这一笔收入,经济状况就会比较糟糕。

就一般情况来讲,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农户家庭收入来自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就务农收入来讲,在同一个农村地区,均分的土地制度使得每个农户家庭都占有相差不多的耕地,经营相差不多的产业,可以获得相差不多的农业收入。就务工收入来讲,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决定了一般的外出务工人员平均收入水准,只有极少数有一定技术或进入管理层的外出务工人员会有比较高的收入,而一般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都相差不大。这就使得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地区,依靠务农和务工收入的一般农户家庭收入相对平等,且所有农户都会经历大致相同的收入变动的轨迹。

我们可以看以下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

一个家庭,年轻的夫妻 30 岁,生有一女一子,各为 5 岁、3 岁,这对年轻夫妻的父母为 55 岁,则在目前阶段,这个家庭的收入分布和劳动状况为:

父母务农和照看小孩,年轻夫妻外出务工。家庭不仅有两笔收入,而且因为

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主要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也比较低。

再过15年,父母已有70岁,经营农业开始有点力不从心;年轻夫妻已有45岁,在外务工也已工作难找,收入下降;年轻的子女中学已毕业,若未上大学,也就开始外出务工赚钱。

这个时候是一个家庭重要的转换时期,即随着年幼子女的成长及外出务工,年轻夫妻步入中年,而开始返乡从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父母那里接手小农经营。

这个家庭中,在到15年后的这个时间点前的几年,也许是最为困难的几年。也就是说,70岁仍然从事农业,年龄是大了点,45岁仍然在外务工,年龄也大了点,成长起来的可以外出务工的子女,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赚到钱的。因此,这个家庭步入经济收入最困难的时期。

但困难很快就会过去,子女越来越成为务工的较高收入群体,已经中年的夫妻可以回家接手小农经营,这个家庭仍然有两笔收入。同时,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也就顺利完成。

因为务工收入是务农收入的兼业行为,这就使得一般的农民家庭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极低。务工收入的多少并不重要,关键是有无务工收入,有比没有好。没有务工收入,这个农户家庭收入是少了点,家庭生活是有点困难,但这个农户家庭仍然可以维持住基本的生活水准。

因为中国一般农户家庭有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而可以维持相对不错的生活水平。又因为务农的收入解决了一个家庭的温饱及日常支出所需,这个家庭对务工收入的依赖就不那么刚性。由于在农村生活的费用比较低,又进一步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正是农村生活和务农收入,使得中国可以低成本地生产出高素质的劳动力,使得中国农民可以维持一个相对体面^①的生活水平。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定,及中国可以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关键。

综上,农民工事实上依托的家庭收入不只是在城市务工的收入,且农民工事实上并未真正地准备永久依托城市生活,而是计划在不再适合进城务工年龄即返乡务农的逻辑。当进城务工出现困难时,他们即提前结束务工,关键是返乡务农仍然有农可务。而且,这些年龄较大的返乡农民工的子女也正在成长起来,他

^① 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而言。

们可以在不久之后即进城务工。因此,农民工返乡只是一次正常的代际分工的替换,而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这就是 2008 年底金融危机导致 2000 万农民工失业而中国社会却波澜不惊的根本原因。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制度基础

进一步讲,构成当前中国农民可以自由返乡,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一个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是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所谓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指中国农民既可以自由进城,又可自由返乡的制度安排的集合。这个集合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土地制度。

以“家庭承包、双层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使得中国农村的土地被均分到 2.14 亿户小农手中,中国每户小农因此可以典型描述为“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自上而下层层鼓励土地流转,以改变小农经济,形成规模经营,但总体来讲,农民仍然保持了清醒头脑,他们即使在税费负担很高种田亏本的 20 世纪 90 年代,外出打工后也没有将农田抛弃,而是出钱请人种田,为将来在城市务工不顺利而不得不返乡做好准备。取消农业税之后,也很少有农户将自己的耕地用十分规范的方式长期流转出去,大多是不规范的流转,比如送给亲戚朋友耕种,不收取任何租金,一旦返回农村,就可以随时收回土地自己耕种。农户这种不规范的流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深感困惑,也为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所批判(被指为小农习气)。这些批判的最大问题是站在农业的角度,而非站在农民角度来看问题。在当前的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显然是要以农民问题来统领。农业不是问题,土地不是问题,农民才是大问题。当前中国正在自上而下大力推动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这样下去,其结果可能十分糟糕。我们在后面会进一步讨论。

二是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福利制度。

我们通常认为户籍制度对农民是不利的,是歧视性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毕竟在计划经济时代,户籍制度所包含的城乡福利差异是极大的。不过,当前中国城市户籍的含金量越来越少,相反,农村户籍开始变得具有含金量。在沿海地区和城郊农村,农民想获得城市户籍易如反掌,而城市市民想获得农村户籍则基本上没有可能。在一些城中村,村民是在为保卫农村户籍而斗争,而不是为